

鸦片战争后闽粤人大量移居 东南亚的原因及其文化背景

黄洁玲

(汕头大学出版社 515063)

一 闽粤人大量移居东南亚的原因

1. 家乡就业不足和贫苦经济状况的压力。

鸦片战争后,我国许多沿海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资本主义的商品就从这些口岸像潮水般地涌进来,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益解体,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相继破产。在通商口岸附近,尤为严重,出现了庞大的失业队伍。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正在萌芽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又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扼杀和排挤,因此根本不可能容纳这批失业大军,这正如恩格斯所精辟指出的:“对华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不可能……于是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也随之而日益瓦解,同时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亦随之崩溃,千百万人将无事可做,不得不移往国外。”^①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农村加速破产,地权日益集中,把广大农民剥得一无所有,不仅“生齿日众、地狭民稠”的粤东和闽南一些地区大批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人民不得不漂洋过海,出国谋生,就是在一些耕地和山地不少的地方,也同样存在人民出国谋生的问题。例如,本世纪30年代中期广东中山一县,每方公里之耕地,其平均人口只有842人,全年产谷达635万市担,除供县民消费之外,还有余额,推销邻近各县,又如番禺、南海,新会都属这种情形。^②这些县份也由于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剥削者手中,而贫苦农民却一无所有难以为生,于是被迫出国谋生。旧中国经常发生灾荒,但旧制度根本不可能解决救灾问题,结果内地人民只得外出“逃荒”,沿海人民不得不出洋谋生。据饶宗颐《潮州志》载,1922年发生在潮汕一带的“八·二风灾”,财物损失六七千万元,死伤人数8万余人。这次特大的“海风潮”过后,就有一些无家可归的灾民只身飘零海外,另觅栖身和糊口之地,本世纪30年代中期对汕头附近某侨乡905个家庭的调查,可以反映侨乡人口迁移国外的基本情况,调查情况如下:

出国的 主要原因	经济压迫	南洋有 关系的人	天灾	企图发 展事业	行为 不检	地面 不靖	家庭 不睦	其它
户数	633	176	31	26	17	7	7	8
百分比	69.95%	19.45%	3.43%	2.87%	1.88%	0.77%	0.77%	0.77%

(据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此外,在侨居地对老华侨调查,也可得到大致相同的结论,根据调查,在古晋被访问的父老中,他们南来的原因,有八十巴仙(80%)是因为在家乡生活困难,有些是由于乡人早已有先来砂朥越,故也随后南来者,实际原因也是因为经济的压迫,这个调查表明,因不堪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或南洋有亲属关系南来是华侨的主要成分。

综上所述,近代华侨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近代华侨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出身,他们出国的主要目的是寻求生计,同时也为了挣点钱赡养留在国内的家庭成员。近代侨汇由此而来。

“信一封,银二元,叫妯(妻)剋苦勿愁烦;仔儿着支持,教伊勿博钱,田园着缴作,猪仔哩着饲,等到赚有紧紧回唐来团圆。”这是20世纪初期流行于潮汕一带的民歌,它生动地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出洋做工的目的。

近代以来,几次革命的低潮,也出现过逃避政治迫害的海外移民,如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和闽南地区小刀会起义的失败,迫使不少起义者流亡东南亚,又如辛亥革命以后,闽粤两地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繁多,拉夫抓丁弄得民心惶惶,两地人民因此出国的也不少。

2. 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劳动力的掠夺。

这一时期,大批华工移居东南亚的另一原因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劳动力的掠夺。十七八世纪,南海上多次发生殖民者抢劫船只,掳掠华工的事件,对沿海商旅和渔船构成严重的威胁。19世纪初期,广东省开始出现所谓“卖猪仔”的活动,我国最早的文献提到“卖猪仔”的是道光七年(1817年)张心泰所撰的《粤游小记》“广东省……有诱愚民而贩卖出洋者,谓之卖猪仔”;道光十九年(1839年)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给总理衙门的上奏中也提到:“十余年前,连值荒年,出洋者数以千计。当其在船之时,皆以木盆盛饭,呼此等搭船者一同就食,其呼声与内地呼猪相似,故人目此船为卖猪仔。”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华工的活动空前加剧,于19世纪中期形成高潮。因此在源源不断的移民中有数量颇大的契约华工,构成这一历史阶段闽粤人移居东南亚的重要特点。契约华工大批移居东南亚,固然和国内的因素有关,但是资本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允许外国来华招工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华工大批移居东南亚的因素。据汕头海关记载,1869—1872年从汕头抵新加坡的旅客有10万多人,其中大多就是被贩运到新加坡,然后被转卖到东南亚各地的“契约华工”。1888—1898年运往苏门答腊德里烟叶种植园的华工,就有5万多人。

这个时期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夺华工的主要形式就是臭名昭著的“猪仔”贸易。作为契约华工发展的标志,便是猪仔馆在我国沿海各通商口岸如广州、汕头、海口、厦门、福州先后发展起来,19世纪中叶是“猪仔”贸易的全盛时期。当时汕头是外国人口贩子来华拐贩华工的中心,到1876年这里的猪仔馆已有30家,据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1890年记载:“华工出口,每岁十余万人,由汕头来者十居七八。”据老华工回忆,直到1912年汕头仍有22家拐贩华工的“客行”,1919年以后才撤销,转到香港。^③

这类移民的华工,在英荷殖民地社会中,称之为“咕哩”(即苦力),实际上是沦为工奴,境遇极其悲惨。福建籍老华工林文聪回忆说:“在南渡沙撈越时,从汕头乘船至新加坡,再由新加坡转乘煤炭船至古晋,当时,船上设备极其简陋,我们五百余人,关在船上,过着真正的‘猪仔’生活,到了诗巫垦区目的地,住的是‘亚答屋’,好像福建上游火薪(火柴)厂工人的住屋,又像本地人达雅克人的长屋(为临时而建的简陋土木房屋)。当时生活极其困难,耕田全用中国古法,用牛或人犁耙,收成甚微,只能过着非常淡泊的生活。当时野兽出没无常,对人的生命财产均有威胁,虽那时一支鸟枪只值十五元,但买得起的人很少。”潮汕民谚所谓“日里窟,会得人,委得出”,正是印尼日里种植园华工遭遇的真实写照。通过“猪仔”们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及世界舆论的谴责,猪仔贸易终于在20世纪初期的东南亚消失了。但由“猪仔”的血和恨凝成的历史却永远告诉人们,“猪仔”的出国史是一部眼泪汪汪的苦难史。

二 闽粤人旅居东南亚的文化背景

前而所述,造成闽粤人旅居东南亚的政治、经济等原因,其实在旧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着,而在走投无路时敢于闯南洋的人,多为闽粤两地的人民,这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容是十分值得重视和探讨的。这就是长期形成于闽粤两地的海洋文化背景。

所谓“海洋文化”，是指以商品交换为主要经济模式的人类文明，典型的是“地中海式”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形成海洋文化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1)有相距不远，不同物产的交流对象，如地中海周围各地区。(2)有特殊的商品可供交换，如瑞士手表，意大利皮鞋。(3)有方便的海上运输。

中国虽具有万里海疆，但真正符合上述条件的并不多。环渤海黄海地区，由于古代朝鲜半岛长时期为中国附属国，日本则是以中国大陆文化为其母文化，因此在文化背景上差异较小，形成的交流不大；而在东海的漫长海岸线对面是浩瀚的太平洋，缺乏交流对象，只有到濒临南海闽粤两地，才具备条件与东南亚各地形成商品交换市场，因此中国比较典型的海洋文化表现在闽南、粤东，其中以潮汕地区更为典型，以致形成现在“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各有1000万余人的局面。

由于粤东地区处于“省尾国角”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处五岭与海滨的狭小地带，自古与中原交通不畅，与中央政权关系较为疏远，反而客观上与东南亚地区海上交通便利，很方便漂洋过海。这种特殊地理格局，使人们形成“背靠陆地，面向海洋”的心理，一旦内地局势有风吹草动，他们便想到南下逃生。历史上几次改朝换代，大多数不愿为新政权效劳的臣民自然选择南下道路。

这一地区的海洋文化是以海上生产为物质基础的。他们捕鱼，晒盐，海上航行，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偶然性，这种生产方式与大陆农耕文化截然不同，形成他们坚毅不拔的性格和克服各种困难的技巧；流动式的生产方式也使他们形成自由散漫、不受拘束的性格，这些都是海上移民所需具备的主观条件，一旦客观条件具备，海上移民自然形成。

相对而言，广大的大陆农耕文化熏染下的农民，就不具备这种条件，他们信奉的是儒家“父母在，不远游”、“故土难离”的信条，比如历史上黄河地区屡受黄河灾害，造成黄泛区“片瓦不存”的局面，人们逃荒到外地，经过几年复苏后，仍要千方百计回到旧居之地，依靠铁牛等巨大标志物寻到自己旧居点，又在那里生根繁衍，这块土地牢牢地把人的一生及其理想拴在这里，这种宁死不离开故土的思想是与具有海洋文化因素的人颇为不同的，难怪一位潮汕老渔民在看完电影《白毛女》后说：“杨白劳既然连死的决心都有，为什么他不跑。”短短的一句话，却充分表现出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这两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差异。

虽然我前面所分析的政治、经济等原因给移民提供同等的客观条件，但是向海外移民形成高潮的仍在闽粤两地，这除了由于海上航行技术外，更主要的是不同文化背景造成的，历来研究者较注重我前面所述的客观物质条件，这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深入到文化大背景中去挖掘移民者主观心理原因，更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闽粤人向海外发展，与其它国家的移民不同，他们的外移纯系出自个人向外求生存与发展的动机，其移民目的都是经济性而非政治性，他们漂洋过海，离乡别井，寄人篱下；在近代，他们又身背“契约”，饱受殖民主义者的压榨与欺凌，就凭着炎黄子孙艰苦卓绝，埋头苦干的精神，他们世代坚持与居留地人民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居留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繁荣作贡献，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身在海外，心怀桑梓，有着爱国爱乡和思乡怀祖的真挚感情，这种感情既源于悠长的民族传统，更与华侨本身的处境和特殊条件分不开。因此，每当祖国和故乡开展革命和进行经济、文教的建设和发展时，他们总是热情地支援，今天，海外华侨、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发生显著的变化，他们不仅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作用，而且在促进我国经济建设，扩大海外影响方面，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优势，更有效地促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责任编辑：翁奕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月版，第467—468页。

②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

馆，1939年2月出版，第15页。

③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猪仔”华工访问录》，1979年，广州，第16页。